

ZHONG RI XUEZHE
DUI TAN LU

主 编 刘大年
副主编 郑 惠

北 京 出 版 社

中日学者 对谈录

——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
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中国代表团
与日本历史学家
远山茂树，井上清
(前排左4、5)
合影



中国代表团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
所参加讨论会



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
参加讨论会



中日历史
学家刘大年(左2)、
卫藤沈吉(左1)
在河北易县西陵合
影

序 言

刘大年

一

一年以前，这部书已经出版日文本。主编者是井上清、卫藤沈吉，书名叫《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1988年9月东京原书房发行。中文本《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的内容、编排与日文本全部一样，只是把前者的序言、跋语移作附录了。书名叫《对谈录》，是为了突出它是中日学者共同讨论的结果。学术问题，有时要夹带点咬文嚼字。“对谈”有异于时下流行的“对话”，更符合于双方共同讨论的实际情况。

关于诞生这部书的1987年学术讨论会，我曾写有一篇短文，予以评价，题目叫《从京都到东京——记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载在《中共党史研究》创刊号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亚细亚大学校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先生，他们主持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以及日本学术界的其他朋友，为主办这次讨论会，做了卓越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讨论会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那次讨论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井上清先生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跋语中，引述了我在讨论会结束后在庆应大学楼前向与会日本学者告别时说的话：

京都创始，

东京集成；

先后接力，
成此盛举。

现在我要说，那个话不止适用于讨论会本身，也适用于这部书的出版。日文本变为《对谈录》，准备工作几起几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负责同志热情支持，使之得以实现。倡议筹办和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日本朋友见到这个文本，我想也会感到欣快。

二

这部文集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具体问题提出来了，还应该深入研究，使现有成果得到发展。从总体看，这部书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年2月，我在一个会议的发言中引述了《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的基本论点。我说，它是一部有份量的书，强调指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以后^①，引起国内外的反响，议论见诸众多新闻媒介。虽然那些议论的中心并非为了讲这本书，而我们却可以看出它与评价这部书的直接联系。

国内的反响，是一致支持反驳日本当局的无理辩解，《中国青年报》所载《访刘大年》^②和《人民中国》8月号的《对谈》各有披露，不去细说。

国外的反响立论角度不同，但没有哪个评述是与书上的基本论点相左的。日本共同社播发记者伊藤正自北京发出的报导，标题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刘的讲话。天皇的责任问题在扩大》。其中说，“中国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反应是极力克制的。但对于日本国内重新兴起崇拜天皇的热潮逐步提高了警惕。可以说，刘大年的批评表明中国国内由于首相的发言而一举暴露出不信任 and 不满。”^③时事社发出评论：说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说是否为侵略战争，应由后世的历史学家作出评价，对此，中国和韩国等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原国土长官奥野在去年5月因

为讲‘日中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而辞职。不难想象，这次发生问题后，首相对奥野辞职会记忆独新”④《读卖新闻》2月21日夕刊登载黑字大标题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判首相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发言”。《朝日新闻》在报导中，根据香港发回的消息，说我在发言时手里拿着《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本书。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文中说，批评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发出的，“竹下登被指责为违背了好些同意中国的说法的日本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战争是以日本入侵中国为开端的。这些说法是很难反驳的”⑤。苏联塔斯社政治观察家阿斯科尔德·比留科夫在长篇评论里说，“轴心国发动了反对人类的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联合国对这个事实所作的评价已载入遵循联合国大会所批准的国际法原则的纽伦堡和东京国际法庭材料”。刘大年的发言指出，“日本国内大部分历史学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早就对那场战争（日本侵略战争）作出了一致的评价”。“日本当权人物不承认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固定评价的企图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给自己忠于和平政策的保证的诚实性投下了让人怀疑的阴影”⑥。”美国纽约《中报》发表社论，批评日本当局自欺而不足以欺人。社论特地叙述：“刘大年以日本新近出版的《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为例，说明包括编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兼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在内之多位日本学者，无不以日本侵略为定论”。社论并引述了远山茂树教授在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⑦

国外舆论如此强烈而又像一个声音一样讲出来的话，与我们评价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第一，那些言论不是学术评论，更非某种书评，但是它们讲的基本论点，也就是《中日学者对谈录》的基本论点，不带支离含糊，更没有异议相左的地方。第二，那些言论中，或者指出本

书的观点，或者直接引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是明白无误，承认本书的可信性，或者说承认它的权威性。第三，对于抗日战争这段重大历史看法如此一致，说明本书的基本论点，不是少数历史学者一家或几家之言，不是少数人的私言，乃是世界各国众人之言，是天下之公言。由此可见，国际众多舆论媒介像一个声音讲出来的话，尽管不是为了谈论这本书，却又是一致直接充分肯定了这本书。这个事实是太明显不过了。天下的公言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一要有人宣讲，二要经过科学研究来宣讲。《对谈录》从科学研究来宣讲天下的公言，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缺少科学性，以至根本算不上一门科学。他们的理由是，不用说实用主义、庸俗无聊的东西了，严肃的历史著作也总要受到国别、民族限制，摆脱不了民族利己观念的纠缠。同一问题，各执一词，黑白真伪，难成定说。如果说，这种看法指出了不少历史撰述确实存在那种严重缺陷，但是因此就否定整个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只表现了学术上的糊涂观点或偏见。社会历史与自然现象不同，是由具有不同思想意志的人活动的产物，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必然要存在非科学性。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都包含着矛盾，都需要具体分析。民族关系、民族感情就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特别需要分析的问题。关键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独立分析精神。《中日学者对谈录》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样板。日本学者的论文占全书2/3，内容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作者尊重事实，独立分析，采取客观冷静态度对待民族矛盾、民族感情，使这些论文“不期然地构成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史论体系”^⑧。中国学者的论文，同样贯彻了客观分析，没有人可以指出其中有什么“民族狭隘性”。就因为这样，他们不约而同得出了基本的共同的结论。这对于那种以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不科学的观点，实在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在涉及民族关

- 系、民族矛盾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坚持科学态度，这一点，意义格外深长。

历史著作各种各样。《对谈录》不是一部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系统著作，但它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名著，是一部由中日学者集体创作的名著。现在它已经受到重视，其影响今后也将要传播下去。

三

中国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出版了大量论著，但全面叙述那段重要历史的系统著作仍感寥寥无多。前几年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上提过一个建议，主张集中力量写出一部比现有水平再高一些的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同时编一部基本的资料书。著作要充分汲取中国、日本和世界各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成果，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代表性；资料书则要求依据档案等原始材料，反映历史的主要过程。一部新水平的书，一部较为扼要完整的资料，可以推进科学研究工作，更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

写出一本全面的抗日战争史，是社会上不少人关心的事。今年2、3月间，由于前面提到的那次讲话，我接到国内外大批热情洋溢表示赞同的来信，不少信上并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写书便是一些来信的建议之一。一位居住巴黎、谦称“愚侨”的陈庆怡（字强先）先生的来信，详细讲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过去快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关于写书，他说，“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问题，原是不争之论。只不过日本自知罪恶深重，妄图掩耳盗铃，不肯承认而已。最好由中国邀集日本及战时遭受其侵略之害各国认识公道之历史学家，共撰一部《日本对外侵略史》，并请日本政府高明详列有关侵略之各种学说，同样邀集各国之国际法家，逐说论列，作为附录，战争半个世纪之后，足为公论。不宜再往后世推托”^⑨。陈先生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

题目、办法可以斟酌，而这项工作需要动手来做。尽管往后人们会多次写这样的书，而我们现在来写有现在的适当条件和必要性。“不宜再往后世推托”，这个话讲出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抗日战争的内容格外丰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要有具体项目。而又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范围来看待这个工作，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个具体项目上。抗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怎么空前，怎么伟大，那时只是一个概说，一种展望。5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说得全面、实在了。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在那以前，每一次革命斗争、爱国运动各有功绩，却没有任何一次足以比得上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车轮的显赫功绩。第二，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下取得的。这些觉醒了的爱国力量，有今天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先辈，有海外一切关怀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研究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空前觉醒的、爱国主义的历史。第三，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重要性。中日两国都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发生了极大变化。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前进的道路，是中日两国关系上唯一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是那场严酷战争给予人们的根本教训。第四，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论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忽视以至撇开中国抗日战争，就好像闭着一只眼睛看世界，不能见其全局。这不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也涉及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特别是东方发生

的一系列历史巨变。抗日战争的所有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全面深入研究它们，更多的了解这段未久的过去，对于我们将能够更好的辨认历史前进方向，正确的分析、看待现在和未来。因此，今天不是要考虑这种研究是否差不多了，而是要讨论如何真正有计划地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确认抗日战争的性质，关系到研究讨论的每一个方面。《中日学者对谈录》从科学上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出版中文本，对于我们要进行的具体项目和有关的广泛研究，都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些对谈文章警醒生动，可以估计，众多的读者会同样感到饶有兴趣。

1989年12月

【注释】

①198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②1989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③1989年2月21日共同社电讯。

④2月21日时事社《大丧礼之前，为平息事态而努力》。

⑤费朗西斯·德隆：《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1989年2月22日《世界报》。

⑥1989年2月21日，塔斯社俄文电讯。

⑦1989年2月27日《中报》社论：《欲盖弥彰的裕仁战争罪行——再斥日本洗刷战争罪责之蠢行》。

⑧1989年，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井上清：《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

⑨陈氏来信上注明：John C. CHEN, 20r, de la Terrasse, 75017 Paris, France. 日期是1989年3月13日。信的其他部分见1990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本文附注。

目 录

序 言	刘大年	(1)
一、近代日本历史上的日中战争	井上 清	(1)
二、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刘大年	(22)
三、抗日战争的起点——卢沟桥事变	王汝丰	(50)
四、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称谓问题		
.....	木坂顺一郎	(70)
五、通向卢沟桥事件之路		
——十五年战争之一窥	江口圭一	(86)
六、日本是如何在教育中灌输中国及		
亚洲情况的	本山幸彦	(101)
七、抗日战争史研究之课题	池田 诚	(124)
八、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点	张振鹑	(131)
九、满洲事变侵略势力的形成过程	古屋哲夫	(152)
十、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	铃木隆史	(165)
十一、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	吴于廑	(185)
十二、日中战争与日本新闻宣传媒介的		
反应	池井 优	(199)
十三、日本陆军的中国观	波多野 澄雄	(216)
十四、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	齐世荣	(231)
十五、日本的日中战争观		
(1937~1941)	今井清一	(257)
十六、日美开战后的日中战争	藤原 彰	(277)

十七、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	郑 惠	(291)
十八、日中战争与日本在华纺织业·····	高村直助	(313)
十九、北支开发株式会社的成立·····	中村隆英	(333)
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		

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远山茂树	(351)
---------------	------	---------

附 录

日中学术讨论会筹备者序·····	卫藤沈吉	(353)
京都学术讨论会回顾·····	井上 清	(361)
执笔者介绍·····		(368)
后 记·····	郑 惠	(370)

一 近代日本历史上的日中战争

井上 清

(一)以中华民族为敌

1937年7月7日夜至8日晨，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本支那驻屯军一部向中国第29军某部发起攻击，双方交战持续了9日、10日两天。11日，支那驻屯军参谋长与29军38师师长签订停战协定。该协定的达成并非建立在双方确认事态真相的基础上，而是日军单方面将责任强加予中方。虽然不能说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其至少没有使当地的战争事态愈加扩大化。

然而，就在同一天，东京政府接受了陆军中央的要求，作出向华北增派5个师团兵力的决定。他们旨在借此良机，以“自治”、“特别”区域之名，达到将整个华北完全纳入日本统治之下，这个自1933年以来觊觎已久的目标，即最终使中国国民政府从属于日本的野心得以实现。

当日，政府向全国发布紧急声明：要求“支那”方面就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不法行为”及“排日侮日行为”表示谢罪；当务之急是要为今后杜绝类似情况发生而增加“适当的保障”，故政府作出向“北支那”派兵的“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天晚上，近卫首相在其官邸召集了各报社、通讯社和各党派及财界的代表，希望在此种情况下他们能够与政府同心协力。对此，所有与会代表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鼎力合作，演出了一幕“举国一致”的闹剧。然而，这些人中又有谁能够料到正是这种“举国一致”将日

本推上了亡国之路？

7月12日，尾崎秀实写了一篇题为“北支问题的新阶段”的评论文章^①。他是一位多年从事中国研究、发表过许多有关日本所应采取对华政策的正确报导及论断的伟大记者，即真正的爱国人士。该文主要论点如下：

卢沟桥一带发生的日中两国军队冲突将引起两国间的全面冲突。由于日本的出兵，可能使中国一时屈服于日本，但归根结底两国关系只会进一步恶化，必然导致“更加严峻的解决办法”。

“北支问题当今已成为全中国的问题，且须注意到，所谓全支那问题并不单单是指掌握着整个支那统治政权的国民政府的问题，事实上是指日本在以整个支那民族为对手的问题”。

“就国民政府现有的武力而言，并不可怕，问题在于会不会激起支那民族战线的全面抗日战争，这一点至关重要”。

尾崎的分析鞭辟入里，极为精湛。在当时严格的检阅制度下，尽管尾崎也只能闪烁其辞，不能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今天来看这篇论文，其结论是明明白白的，即尾崎明确预言：日本虽可一时取胜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最终必定败给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回顾日本近代历史，自1874年进攻台湾、特别是1894—1895年的日清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曾屡次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的日中战争从根上迥异于以往的战争。在以往的战争中，日本的对手是那些中国的封建皇帝、地方军阀以及具有军阀性质的国民政府，它们无不与中国人民大众相对立，因此比较容易取胜。可是，“七七”事变之后，正如尾崎所示，日本的对手则是全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并且，该统一战线并非是国民政府组织的，而是由中国的爱国民主势力和共产党在抵制国民政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最后迫使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也加入其中。

此外，在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屡遭重挫之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中，亦出现过汪兆铭之类的叛徒；蒋介石总统曾一时产生动摇。然而，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却从未屈服，而是越战越强，并取得了最后的彻底胜利。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尾崎在上述论文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日中战争将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一件大事展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亦正是如此。

（二）孰 为 败 者

政府和军部全然不顾这位忧国的记者所洞察、预见的一切，确信在日本作出“重大决策”及动员重兵的情况下，无须真正交战，中国方面就会一如旧贯，乖乖地俯首贴耳，而且即使一旦爆发战争，也会轻而易举地取胜。就此有段小插曲：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禀报天皇奏准向中国出兵时，曾对天皇夸下海口，“事变只需一个月左右时间即可解决”②。还有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他起初主张首要的任务是作好对苏作战准备，而反对此间向中国出兵，但到最后，迫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也只好随波逐流认可出兵。不言而喻，他当时坚信不疑，只要大兵压境，中国便会立即屈服。

的确，从最初的战争形势来看，日军在华北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连连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铁路及军事重镇。可是，在华中的上海战线，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击，陷于苦苦鏖战之中。直至大部队在杭州湾登陆，那里的日军才摆脱困境，然后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进攻，并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自此，国民政府转移到内地，在武汉设置了抗日战争总司令部。

进攻南京之前，石原莞尔等人慑于中国抗日力量之强大，率

先提议进行和谈。石原认为，如此继续扩大战争，日本将陷入中国泥淖，亦无法完成对苏作战之准备，此外，还会促成中国方面的抗日意志更坚决，中国共产党势力更强大。为此，应在现存的蒋介石政权仍统治着全国之际，与其媾和。

政府在攻克南京前亦曾考虑过通过德国实现讲和，但是，一旦占领了南京，近卫首相及广田外相却不谋而合地认为，国民政府已沦落为一地方政府，日本离大获全胜只有一步之遥，作为胜者，日本不应首先向战败的中国提出言和。为此，参谋本部和政府围绕着是否同中国进行早期和谈问题，各持己见。结果政府方面因获得天皇的支持而占了上风^⑨。1938年1月11日，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决定：只要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请求和谈，那么日本将不承认国民政府，而尽早扶植起日本策划已久的华北、华中傀儡政权，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此时，即便参谋本部的意见得到通过，日中早期媾和亦不可能。因为参谋本部的媾和条件中，不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伪“满洲国”，而且还要求在华北、上海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给予日本在华北经济特权等等，这些苛刻条件是连蒋介石都不会接受的。退一步讲，假使蒋介石在此问题上产生动摇，中华民族也决不会答应，而且会愈加激发他们的抗战情绪。日本已经失去了日中和谈的主动权。

日本就是这样一步步陷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武汉及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就此，日军的战略进攻告一段落，尔后进入两军相持阶段。

近卫内阁由于找不到战争的出路，于1939年1月宣布全体辞职。这件事情同时意味着日本已经承认侵华战争的失败。此后，任何一届内阁政府都没能给战争带来好运，同时亦无力停止这场战争。1938年末，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兆铭实际上已投降日本，于1940年3月，依靠日本的军事力量，匆匆忙忙地在南

京成立了所谓“反共和平”的伪“国民政府”。然而，这一伪政权的出现丝毫没有削弱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从1939年底至1940年期间，中国方面开始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反击战役。

1940年3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确定了以下方针：如果在该年度内不能完成对“支那事变的解决”，不管与国民政府间的和平能否实现，都将于1941年初自行撤军，并截止到1943年，缩小占领区域，仅维持上海附近三角地带及华北蒙疆的一部。藤原彰在《太平洋战争史论》一书中认为，该决定及陆军中央一年前开始实行的逐渐削减在华北兵力的方针意味着，军部“放弃了凭借武力解决日中争端的策略”，“对无望取胜的战争已丧失信心，试图逐渐削减兵力，争取主动撤军，无疑等于承认日中战争的失败，即败局已定”。④

在1940年3月的军部撤军方针中，规定要确保伪“满洲国”及1931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间所猎取的利益，尤其要继续占据在经济上、军事上极其显要的华北一角及上海三角洲。如此如意算盘，中国人民何尝会予以承认呢。虽然如此，作为日本军部，在此问题上则默认了失败，果断扭转了以往的方针。

恰在同一时期，在欧洲，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结成同盟，开始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值此，日本政府及军部欣喜若狂。他们与缔结了反苏、反共的《防共协定》的德、意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三国朋比为奸，悍然发动了世界性战争，梦想使其垂涎已久的英国、法国、荷兰成为东洋的广大殖民地，攫取那里丰富的军事资源，切断来自香港、印度支那、缅甸的援蒋通道，实现对中国的封锁，以期在整个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同时，取得在中国的胜利。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两个月之后，军部一改3月的从中国撤兵的方针，“断然转入长期战略，直至最终迫使重庆政权屈服”。